
評施吉瑞《詩人鄭珍與 中國現代性的崛起》

Schmidt, J.D.. *The Poet Zheng Zhen (1806–1864)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Modernity*. Leiden: Brill, 2013. Pp. xxviii+720.

[中譯本] 施吉瑞著，王立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7年6月。560頁。

魏寧 (Nicholas M. WILLIAMS)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孟飛譯

在這部煌煌巨著裡，施吉瑞 (Jerry Dean Schmidt) 再一次對古代中國重要詩人作出全面綜合研究。此前他對范成大 (1126–1193)、楊萬里 (1127–1206)、袁枚 (1716–1798) 和黃遵憲 (1848–1905) 皆有專論，這次的研究對象則為鄭珍 (1806–1864)。本書體現著者功力之深厚，不單跟前作一樣令人佩服，更是作者迄今為止最具野心的一部論著——發掘一位幾乎湮沒於文學史的詩人，將他重新歸入中國大作家之列。施吉瑞以文學史家的高度翔實地展示了鄭珍的生平和詩作，即使某些微枝末節

容有爭議，但任何對中國文學感興趣的人都得承認他提出的證據充份而有力。

幸虧有荷蘭老牌學術出版社 Brill（博睿）本書才得以出版，他們近年來尤其不遺餘力支持西方漢學。著者在前言（頁 xviii；頁碼為英文原著，下同）提到出版過程中遭遇的諸多困難。這種以「中國重要詩人生平及其時代」為題材的類型寫作，曾經在韋利（Arthur Waley）筆下取得非凡成功，贏得世界各地讀者的好評，但時至今日似乎難以為繼。而施吉瑞幾乎以一己之力復興了這個文學類型，不僅生動還原了鄭珍的歷史形象，同時預留大量篇幅翻譯和闡釋鄭珍的詩作。Brill 能夠出版這樣一部翔實的研究確實令人稱道，惟一的遺憾是施吉瑞的成果未能以價格相宜的形式推而廣之。要是哪家有魄力的出版社能夠像當年的 Twayne 般把握商機，在 1970 至 80 年代初適時地出版那套方便讀者、包括一系列中國文豪在內的「世界作家叢書」，將功德無量。

《詩人鄭珍》一書內容極其豐富，本文無法鉅細無遺地一一評論。施吉瑞延續了此前黃遵憲研究的編排方式，前半為生平研究，後半為大量詩作的英譯，譯筆流暢且優美。鄭珍是貴州人，大半生在原省居住。著者極為重視鄭珍生活的社會環境，甚至提供了一系列簡明的地圖和風俗畫，幫助我們更真切地瞭解其時其地。前兩章非常細緻地介紹了鄭珍所受的教育和曲折的仕途，不禁令我想起齊皎瀚（Jonathan Chaves）在封底的推介文字：「對歷代中國詩人的研究再沒有比本書更為完整詳盡……。」著者

利用鄭珍本人的作品和大量同時代文獻，仔細交代詩人生平大事之餘，成功重構他的心路歷程。其中鄭珍對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的看法和反應，尤其饒富歷史興味。

筆者認為著者對人物的處理唯一有失學術嚴謹之處，是他試圖將鄭珍描繪成一位文化大轉型時期、即中國「現代性」(modernity)的代表，這亦是本書第三章「鄭珍思想中的兩面性」裡的主旨。他花費大量篇幅論證這個在前言中提出，並如書名所揭示的牽強主張：鄭珍是中國「現代性」的早期典範。施吉瑞身為學者過於誠實，無法對讀者隱瞞反面證據，對於鄭珍予人現代性假象的作品只能作持平客觀的描述。譬如第三章探討了鄭珍「正面和負面的現代性」，緊隨其後的第四章展開了有關「鄭珍和宋詩派的文學理論」的探討，翔實清晰地考察了清代詩人如何從宋詩開出法門。他一再認定鄭珍作品的某些方面具有現代性，但又隨即指出在前朝作品中不乏先例。

著者大書特書對現代性界定之不易，強調不同作家對其涵義有完全不同的界說。他特別提出所謂「正面」和「負面」的現代性，前者包括思維開放、理性主義、「同情女性」等特點，後者則體現為罪疚、焦慮和疏離等(頁33-34)。但無論這些價值些是正面或負面，都與文學現代性的價值體系大相逕庭。在文學和文化領域，現代性或現代主義(modernism)的「特徵是背離或揚棄傳統觀念、學說和文化價值，轉為推崇時下的或激進的價值與信

念」。¹ 提起現代性，人們會聯想到畢加索將情人的身段割裂成菱形和橢圓形，又或布紐爾和達利在銀幕上將一個女人的眼珠子割開；² 而在鄭珍的作品裡，頂多只有一絲激進的創新或一點對傳統的揚棄。³ 著者似乎更想強調，詩人鄭珍應當具有吸引現代讀者的魅力。

職是之故，著者在證明鄭珍如何借鑑前代詩人的技巧以融入自身境況時，論述尤其令人信服，並特意在書後附上杜甫《北征》和袁枚《歸家即事》全詩的英譯，令相關論證更具體有力。施吉瑞既展示了鄭珍詩作的價值，卻又為其塗上一抹現代性的虛假色彩，反而掩蓋了背後紮實的傳統詩歌造詣。總的來說我很享受閱讀的過程和佩服這部著作，但書名若可改成「詩人鄭珍與中國傳統的韌性」之類，將能更好地傳達出鄭珍的魅力，忠於施吉瑞的著書之旨。

著者再次回到堅實的立論基礎，分析鄭珍的詩歌技巧和內容，體現博洽的學識和深刻的觀察。本人認為第七章

¹ 《牛津英語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在“modernity”(現代性)詞條下的 1b 義項作如下釋義：「一種思潮或社會觀點，特徵是背離或揚棄傳統觀念、學說和文化價值，轉為推崇時下的或激進的價值與信念(主要與科學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相關)」(An intellectual tendency or social perspective characterized by departure from or repudiation of traditional ideas, doctrines, and cultural values in favour of contemporary or radical values and beliefs (chiefly those of scientific rationalism and liberalism))。

² 譯者按：指布紐爾(Luis Buñuel)和達利(Salvador Dalí)合拍的超現實主義短片《一條安達魯狗》(*Un Chien Andalou*, 1929)內極具爭議的一幕。

³ 第三章提到鄭珍有幾首詩對文化傳統略有微詞(頁 205–209)，但斷非鄭珍全部作品的「特徵」。

講故事的新方法：敘事詩歌（或可譯為「故事新說——敘事詩」）是全書最精彩的一章，論述鄭珍在敘事技巧上的深造自得極具說服力。著者通過細緻剖析鄭珍的幾首長篇敘事詩（大都全文譯出附於書後），展現了鄭珍的詩作如何匠心獨運，用一連串觀感印象與個人經歷再現自身的思路歷程，以嶄新的方式展現個人經驗的全貌。其中一個舉例比較很富啟發性，他首先翻譯了杜甫的「贈八處士」，接著分析鄭珍的八十二行長詩「胡子何來山中喜賦此」（討論見頁414-419，全詩英譯見頁580-583）。一開始說明兩首五言詩的主題大致相似，都是緣自會晤朋友所引發的人生反思，但隨即點出鄭詩的敘述裡出現了不少原創手法，尤其是後半描寫詩人願望屢屢落空、鬱鬱不得志時，出現了許多峰迴路轉的地方。

施吉瑞的分析因立足於對前人詩作的詳徵博引，尤其是杜甫、蘇軾和袁枚的作品，令這部分的論述尤其有說服力。著者頗多引用自己研究袁枚的專著，是學力深厚、著作等身的明證。著者身為袁枚和鄭珍專家，通過對比二人的差異，突顯了他們異於一般文人習性的個人癖好和獨特技法，再次深化了我們對鄭珍人格的認識。這正是第五章「對人境的重新定義」（暗引施吉瑞自己的專著《人境廬內——黃遵憲其人其詩考》⁴）焦點所在，當中考察了鄭珍的人際關係，如他對妻子溫情脈脈的描寫，以及他與母親「情深似海與愧疚難當的關係」（頁322）。

4 施吉瑞著，孫洛丹譯：《人境廬內——黃遵憲其人其詩考》（*Within the Human Realm: the Poetry of Huang Zunxian, 1848-19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本書充份體現了著者的學問淵博和治學嚴謹，只是智者千慮，第五章開篇的首段便顯然受到文本傳統的敘述誤導。施吉瑞自信滿滿地說：「對古代中國人而言，人間就是宇宙的中心」（頁 289），在我看來這句話未免以偏概全，無法概括保存於甲骨文或《莊子》等古代文獻的文化傳統。著者引用了董仲舒對天、地、人的論述，但是董仲舒的想法也可輕而易舉地用來反證，在漢代儒家思想中人間只是「三才」之一，與天和地等量齊觀，共同附屬於某個更大的存在（這顯然牽涉到更大的論題，但是選擇性地說「三才」中以人為貴，這一論斷需要提出證據支持）。更甚者，他隨後在同一段落說漢賦（稱作「散體詩」〔prose poetry〕實在有失準確）「大都描寫宮廷生活」。這句話不單不適於寫二京、三都或皇家苑囿的大賦（漢大賦以極寫動、植、礦物界和天文地理著稱），套用到司馬相如 大人賦 或張衡 思玄賦 等主要以遊仙為題的作品更是落空。將作品的主要內容限定為它們創作的地點，論斷之武斷，就如同說《追憶似水年華》主要描寫在軟木飾面的臥室發生的事情。⁵ 第五章固然成功用鄭珍本人的詩生動刻劃了他的生活形象，但實在沒必要因而歪曲其他中國傳統。

第六章 對自然的熱愛和恐懼 和第八章 關於知識、科學和技術的詩歌 則探討了鄭珍詩歌多種多樣的主題。無論主題是甚麼，施吉瑞的譯文讀起來總是令人賞心悅目。在此不妨引第八章中一首詩的翻譯，以此證明鄭珍之為詩壇作手和施吉瑞之為譯林名家。

⁵ 譯者按：普魯斯特在這間四面牆飾以軟木貼面的房間寫出《追憶似水年華》。

鈔東野詩畢書後二首（其二）

*After I Finished Copying out Meng Jiao's Complete Poems,
I Wrote Two of My Own Poems to Append at the End (One Poem
of Two) (1839)*

峭性無溫容 There was nothing warm or gentle about this
rough and hard man,

酸情無歡蹤 Not a trace of happiness in his pessimistic soul.

性情一華岳 Yet his nature and feelings soar to the summit
of Mount Hua,

吐出蓮花峰 And spit forth a peak like a lotus blossom.

草木無餘生 No trees, no flowers can survive up there;

高寒見魏宗 Everything is frozen on that towering mountain.

我敬貞曜詩 Still I honor and respect Meng Jiao's verse,

我悲貞曜翁 Though I feel terrible sorrow for Meng the man.

長安千萬花 He galloped past Chang'an's flowers when he
passed his exams,

世事難與同 But nothing in the world ever went right for him.

一日即看盡 He finished seeing all those flowers in a single day,

明日安不窮 But could not escape his poverty the following
morning.

貞曜如有聞 I'm certain that if he could just hear what I'm
saying,

听然囚出籠 He'd break into a smile and leap like a prisoner
from his cell!

此處省略了對「華山」和第九行「長安千萬花」用典的注釋。這行詩的翻譯尤其令人擊節稱賞，因為字面的意思無非是“Chang'an's millions of flowers”，但施吉瑞不甘於平鋪直譯，轉而不著痕跡地融入孟郊七絕登科後的典故，並在腳注中全首引用。這種巧妙的改動使譯文明白易讀、雅俗共賞之餘，免卻煩瑣考證的居間調停。這種譯法未必適用於各類文本，但對鄭詩而言卻非常貼切。長篇敘事詩尤其倚賴數十行詩句來營造韻律和氣勢，而對於這一行敘事詩施吉瑞顯然格外留神。過多地出注解釋用典，勢必無可挽救地破壞詩歌的節奏。施吉瑞的處理盡可能用英語譯出詩的戲劇性，儘管本書定價不菲，實在希望更多的讀者能夠拜讀受益。

無獨有偶，《詩人鄭珍》與 Brill 出版的另一部論著堪稱姊妹篇，即已故漢學家白潤德（Daniel Bryant）所著《偉大的再創作——何景明（1483–1521）和他的世界》。⁶ 兩部書的篇幅均超過七百頁，數十年嚴謹治學的成果盡見於此，俱旨在發揚彰顯歷來被忽視的明清詩人。不僅如此，兩書均直言不諱地抨擊了「五四」以來中國文學史的傳統敘述模式，尤其是壁壘森嚴地將某種文類與某個時代掛鉤，諸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彷彿這種「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代有偏勝」的說法最終會接上二

⁶ Daniel Bryant. *The Great Recreation: Ho Ching-ming (1483–1521) and His World*. Leiden: Brill, 2008. Pp. xxxii+718.

十世紀的現代主義思潮。⁷施吉瑞和白潤德對這種模式的批駁，以及對兩位詩人重要性的引證都極具說服力。

話雖如此，這兩部非常優秀的論著未暇為我們提供一個文學史書寫的新模式，用來抗衡根深柢固的舊有說法。將文體類型和時代掛 儘管極具誤導性，但同時為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理論模式。它可使讓學者一筆抹煞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文學文獻，將之定性為過時或無關痛癢，然後為餘下的百分之一提供了明確的評價基準，給予時間緊迫的研究生或助理教授莫大便利。據此，每一篇漢賦都可以用來作賦體文學標準特徵的模範，犯不著考慮漢以後繁複費解的文體演變；一小撮唐五代詞作同樣被賦予崇高地位，下開宋詞之先聲。假如我們摒棄這個模式，那麼一切古詩是否在文學史上都擁有同等份量？然而，1911年以前（姑且不論至今仍然創作不斷的舊體詩）的傳世古詩數量之鉅令人難以想像，對其中長期為人忽視的文學作品披沙簡金，需要借助全新的文學史模式，而這個任重道遠的研究任務還需俟諸異日。無論這種新模式如何，都應當解釋杜甫敘事詩怎樣在晚清詩人筆下重新創作，並還以鄭珍應有的文學史地位。這一點足以證明本書的貢獻之大。

⁷ 施吉瑞對此有深刻精辟的討論，見本書頁9-12。需指出的是著者這種文學史觀，明人李贄（1527-1602）早已預為之說（如云：「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見其《童心說》，收入《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三，頁98。